

木鱼石书局 ● 生活掠影

# 明清生活掠影

*A Glimpse of Lif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王凯旋 李洪权 编著



沈阳出版社

# 明清生活掠影

*A Glimpse of Lif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王凯旋 李洪权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生活掠影/王凯旋, 李洪权编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1. 11

ISBN 7-5441-1719-7

I. 明… II. ①王…②李… III. 社会生活-中国-明清时代  
IV. 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0489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0.125

印数: 2001-60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赵敏 禾森  
封面设计: 君华

责任校对: 蔡桂娟  
版式设计: 赵敏

---

定价: 17.80 元

## 前 言

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朝代，既总结前代的历史，又迎接近代的曙光，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过渡特征。与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相适应，明清时期人们的生活既恪守传统，又有所变化，这些新旧杂糅的生活图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明清历史生活画卷。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描述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它不仅包括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也包括明清时期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生活等等。因为是“掠影”，因而难成系统；即使涉及到的领域，也不过是走马观花，在明清生活的百花园里一掠而过。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通过客观描述明清时期的生活片段，向人们展示这一时期概略的生活情景。因而在写法上以个例为主，以议论为辅，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阐述，以便于读者一目了然。

我们这本书是在学习吸取学术界诸位学者大家的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我们虽然对明清时期的生活史很感兴趣，并且相应地做了些整理和研究工作，但由于才学短浅，对这个领域无论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难以熟练掌握。幸好近些年来学术界有关这一领域的成果不断面世，才给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特别是冯尔康先生的《清人生活漫步》和冯先生与常建华先生的《清人社会生活》两部大作，更使我们

受益匪浅。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希哲先生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作为先生的弟子，我们在书中多处采用了业师的学术成果，先生严谨治学、奖掖后进之风令人敬仰。正是学术界学者大家们的辛勤劳动，才使我们的这本书有了立足的基础，否则，是无法在短时期内完成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本书对一些原始资料进行了加工处理，考虑到方便读者，没有一一标明出处。书中有的篇目还引用了一些明清时期野史、笔记、小说中的奇闻轶事和故事情节，这些文献的征用，可补正史之不足。鲁迅先生说，对于中国历史“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熟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那么，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是杂说”（《华盖集》）。我们对明清生活的认识和本书的写作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认为，明清生活的广阔画面、真实自然的社会生活许多即来源于此。

此外，本书的图片资料均来源于相关著作，如林金树先生的《万历帝》，周远廉、赵世瑜先生的《多尔袞全传》，林延清先生的《嘉靖皇帝大传》，姜守鹏先生的《洪熙帝、宣德帝》、《名胜新闻百图》、《民俗风情二百图》、《中国历代服饰》，刁书仁、赵光元先生的《成化帝》等等。

我们的意图是提供给读者一部清新流畅的通俗学术读物，于雅趣中见历史之真相，于真相中稽历史之脉络。鉴于学力有限，加之时间仓促，许多问题尚需深入研究与拓展，敬请读者诸君教正。共勉学术，读者为师，是我们真诚的愿望。

## 目 录

前言 .....	1
明代的士风 .....	1
明代廷臣的绰号 .....	14
明代科甲多出东南 .....	24
明代讲学风之盛 .....	34
明代的世风 .....	45
明代科举生活 .....	54
明代的官俸 .....	64
明代菜户 .....	76
《金瓶梅》里的奴婢 .....	85
明武宗逸事 .....	95
明代的典当 .....	103
明代的晋商、徽商 .....	111
明代婚姻的嬗变 .....	119
明代的酒文化 .....	130
明代的茶艺 .....	137
《金瓶梅》与市井文化 .....	144
明代的旅游文化 .....	153

明代民间旅游业 .....	161
扬州八怪 .....	170
清代宗族 .....	182
八旗生计 .....	189
清代的士风 .....	197
雍乾轶事 .....	204
和珅其人 .....	214
乾隆惩贪纪事 .....	224
清官于成龙 .....	243
乾隆六下江南 .....	251
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 .....	264
清代私人刻书藏书 .....	276
清代的皇子教育 .....	286
清代的服饰 .....	299
清代民间的婚姻 .....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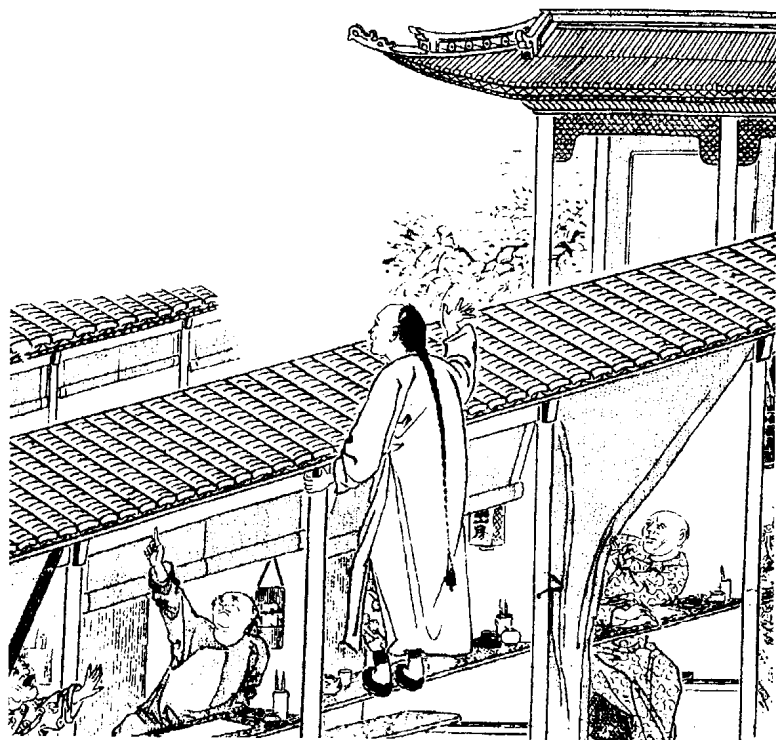
## 明代的士风

从明初到灭亡，明代士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初到万历时期，一是万历以后，在每一个过程中，都有细致的渐进过程，表明士风是一点一点走向复杂和堕落的。作为士人个体，有着丰富多样性，其爱好、性格、情趣，千差万别，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好恶、精神、品格，反映的是时代面貌和时代特色，即在一定的时间阶段里，其价值取向、生活情致、思想观念，有着一贯大致相同的发展方向。尤其在封建社会，我们几乎可以把士习士风看做社会是否安定的晴雨表。

明初，太祖朱元璋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注意对全民的教化，把程朱理学确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用它来治理人民，敦化风气，培养全民尤其是士人即知识分子的忠君爱国观念。因为，在封建国家社会结构中，士是四民之首，而且被认为是秀民，是社会道德良心的标识，是民风民俗学习、形成的表率，更为重要的是，士是国家官僚队伍的重要后备力量，其素质的好坏，水平能力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士风的好坏，以及政治是



否清明。所以，政府非常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育，与之直接相关的就是国家的科举制度及教育制度。明代既然以程朱理学为教育的指挥棒和范本，知识分子就必须紧紧围绕理学来学习和做学问，登第取仕也注定成为国家的服务工具，尽量地消除个体性和棱角，做朝廷忠顺和卑微的奴才。



士在不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是不去承担“社会良心”的责任的，由于没有力量，对社会的任何批判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一旦入仕，他们就要面对是尊君还是尊道的选择。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儒家弟子，以天下为己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而作为君主之臣，又必须服从君主的命令和规定，成为不折不扣的走卒，这种选择有时是极其艰难的。为了维护道，在必要时，士人会舍弃自己的生命。还有就是，知识分子依靠国家的俸禄生活，为了这份薪水，他们被迫得屈从皇权，丧失一部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这就使他们容易陷于向人取媚的地步，想保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完好无损是不可能的。

士是官吏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官吏是统治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时所言的吏治的好坏，就是直接与仕风相联系的，仕风的决定部分正是士风。吏治的好坏往往反映的就是士与君主、王朝的关系。像一般的下层官吏，他们直接负责管理人民、治教乡里，是国家与老百姓之间的最主要纽带，他们和朝廷里的大臣们一样，在明初的时候都是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的，这与明初皇帝的严格要求有关系，也与新王朝的虎虎有生气相关。

作为一个刚从动乱中走来的王朝，明初政府苦心经营，太祖、成祖颇有作为，尤其是不久还出现了仁宣之治，促使官员们对这个王朝比较忠诚，也比较敬业，他们也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与这个王朝休戚与共，为其尽忠、奉献、服务和约束自己，是时代的主流，即便明代的官俸偏低，也尽力地克制自己，努力为国家办事，这是比较不容易的，反映了当时士风的朴素和坚定。这种相对稳定的士风一直保持到明正统年间，由于出现了宦官专权的现象，政治上发生了一些混乱，以后的宪宗皇帝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混乱，偏用宦官和奸佞，致使局面向不利一方更加倾斜。但士风仍然保持着几十年来培养的良好素质，大部分士人忠君爱国，仍以名节

自励，但开始有相当一部分士人趋向逢迎阿谀，结交奸佞。比如宪宗时期的阁臣万安，他不但努力巴结宪宗的宠妃万贵妃，还致力于巴结内侍，给皇帝上书也不怎么讲国家大事。后人在整理宪宗物品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笺，里面都是万安给皇帝写的密折，内容竟然都是关于房中术的。

有一个两个这样的阁臣，在总体上并没有对明朝政局产生太大的恶劣影响，因为大多数朝臣以及内阁要臣还都是比较正直的，能够秉公办事，一心为国为家，而且政绩都非常出色。比如天顺、成化年间的李贤、商辂、岳正、吕原、刘定之等人，他们在位的时间或长或短，但都一样认真负责地做事。像李贤，他是当时非常有名望和威信的大臣，办事有手段，也讲究服信众人，在奖励人才和整饬朝纲等方面都有突出作为，还提拔了许多有能力有胆识的下级官僚，以后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再如岳正，在天顺年间入阁，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堪称敢作敢当，尽心尽力。有一天，他在朝廷上与皇帝大臣们一起论事，讲到慷慨激昂处，唾液飞溅到皇帝的身上。他对皇帝可谓忠心耿耿，但在那种官员流动性非常大，动辄被一点小事牵连并获罪的封建政府里，还是很容易被一脚踢开或遗弃的，他后来就因为某件关于结党的事情而被皇帝贬到了地方上去做官。有一次，英宗皇帝想起了他，很是怀旧，对身边的人念叨了一句：“岳正这个人啊，挺好的，就是胆子大了些。”这话传到了远在边地的岳正的耳朵里，他非常感动，认为就此死去也值得了。可见其虽然被皇帝抛弃，但还是一片热诚，就因为皇帝心血来潮的一句话，竟然激动不已。

在当时，像他这样的官员很多，于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代表。他在英宗前后任职，尤其在发生“土木堡之变”的时候，勇敢地承担起国家危难时的重任，率领军民保卫北京，艰苦卓绝地取得了“对瓦剌也先军队的战争胜利，支撑起了明朝最艰难时期的政局。但因为他没有坚决地支持英宗复位，在这个问题上导致了自己最终的被杀，连生命都奉献给了明政府。在他死后，复辟的英宗派人去他家里搜查，穷得要命，仅仅在正屋发现了锁得严严的柜子，打开一看，是景帝赏的衣物而已。

可以说，一直到此时，朝廷里的士风仍然都是比较好的，官吏们廉洁奉公、直言敢谏，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正直气节和风骨。他们爱国爱己，为了心中的至高信仰还在努力工作和奋斗。在这时，明代已经开国一百年，经历了许多内忧外患，但士人们仍基本抱成一团，维护国家统治秩序，避免国家朝政的混乱及社会局势的进一步动荡。最高权力阶层再怎么争斗和更迭不休，一直没有对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和损害。而且，朝廷里一旦有什么奸佞和不利趋向，言官们照常仗义执言，不畏强权，认为拓宽言路乃是自己天经地义的使命和责任，即使因此获罪也不在乎。当时以士大夫们这种敢于抗疏论救的坚定作风而纷纷称为美谈，我们今天从明代的《实录》中也可以看到，里面敢于直言上谏的记载到处都是。这表明，朝野上下的整个士人集团还都是处于一种奋发向上的气氛中，社会上升的势头比较强。

## 二

到了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年间，这种尚称良好的势头

被破坏了。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政治局势、社会主流思想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它们的恶性作用下，士风不可能不发生巨大转变。

在嘉万时期，社会经济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生产规模扩大，生产力提高，而且商业往来和商业流通日益频繁，空前繁荣，许多市镇迅速兴起，这些都刺激了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风尚的急剧变化，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体现得很明显。违禁逾制的事情频频发生，崇尚奢侈的生活，挥霍无度，竞相攀比，等等。这些必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产生极大的影响。社会上普遍重视起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崇拜金钱和财富，连许多士大夫都忍不住去经商，社会上关于弃学从商的事例就更多了。

在明初的时候，政府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之学，加之其又对社会的思想统治比较严格，社会思想没有太大的异动。而中后期，王学兴起，它抛弃了理学僵化的束缚，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客观上起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作用，在社会上占据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促使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都被重新审视和思考。在这样的冲击和震荡之下，士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思想、行为上被迫也发生变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一百年来，明代政局总体上是在向着下坡路走，这时朝廷政局里又发生的一些大事，更成为促使士人士风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

在正德年间，武宗信任身边的宦官，不理政事，他每天都在宦官的陪伴下寻欢作乐，宦官们掌握了很大的势力，号称

“八虎”，排斥和打击朝臣势力，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大臣们联合上书揭露八虎的罪恶，要求将他们正法。武宗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打算处理掉身边的宦官，但此事让宦官们知道了，他们趁着自己对皇帝贴身的机会，对武宗连哭带闹，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迫使皇帝临时又改变了主意，转而去逮捕主要提议提此



事的朝臣。大臣们的正直势力被挫败并有所损耗。但此事并没有就此完结，怀恨在心的宦官们借机开始报复，尤其以握有大权的太临刘瑾为首，他们仅在前后三四年的工夫里，就寻机打击、迫害了七百多名官员，或廷杖，或削职，或下狱，或降级，或凌辱，或罚俸，采取了各种可以做到的办法来整治朝臣势力，使大臣们饱受摧残。比如，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夏天的一次早朝，刘瑾发现大殿里有一封匿名信，指责自己有不法行为，他非常生气，伪造圣旨让大臣们在奉天门下跪，自己当场在那里询问和追查写信人，因为一直没结果，就一直让大臣们在那里跪着，在酷暑之下，有被晒昏的，更有人被当场晒死。

可以说，朝臣们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丝毫无错的，他们从维护皇朝的大一统出发，反感和限制宦官势力的发展，是正当行为，更何况明太祖时就已经明确下令不许宦官干政。但在整个刘瑾掌权期间，朝臣们在心灵和肉体等诸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迫害，意志已经有所涣散，忠君爱国之气大为挫伤。

经过这样的事，按理明武宗应该有所警惕和转变才对，但他照旧我行我素，不但毫不检点，更是变本加厉，尽管有责任心极强的朝臣在一边不断提醒和敦促，他却对之不予理睬。发展到正德十五年（公元1519年），皇帝竟然要以大将军的名义南巡，大臣们忍无可忍，集体加以规劝。明武宗勃然大怒，下令把相关的官员统统下狱或罚跪，事态向着激烈方面进一步发展，双方都互不相让，结果是有大批的官员被贬官、夺俸、廷杖、戍边，官员们用一腔热血所换来的只是屈辱。

发展到嘉靖时的“大礼仪”事件，它彻底地伤了朝臣的心。正德皇帝没有子嗣，由嘉靖即位，嘉靖是正德的堂兄弟，他的父亲兴献王是正德皇帝之父明孝宗的弟弟。嘉靖皇帝执意要对自己的亲身父母行尊奉典礼，而这是不合乎封建正统规定的。于是皇帝与朝臣之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长达十余年，是为“大礼仪”。其关键只在于：世宗嘉靖皇帝究竟是继嗣还是承统，称孝宗为皇考还是皇伯考，对兴献王和王妃的尊号怎么定等问题，大臣们太死板不讲变通，皇帝又太执拗不肯退让，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朝臣，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妨碍了以后必要的君臣沟通；在皇帝，心灵早成阴影，与大臣交恶。在嘉靖一朝几十年内，奸佞和柔媚之徒屡出，极大地扰乱了朝政，严嵩等均是这一期间掌权上台的，终

嘉靖后期，朝政一片黑暗，阁臣倾轧不停。

连连地如此打击，士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沉重的创伤，他们绝大多数忠诚地维护这个政权，一片赤诚地为这个政权着想，却不料，这个政权已经腐朽到了不但不领情反而对这种热诚之气大加鞭挞的地步。对待朝廷越忠诚，得到的摧残越大，对这个政权越尽心，得到的打击越剧烈和痛楚。其实，肉体的折磨还在其次，精神的迫害是最重要的。作为知识分子来讲，他们对精神的东西看得更重，期待实现的也多是纯洁和高尚的理想。极其黑暗的事实给了他们无情的一击，告诉他们不要再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这个朝廷只能虚应和敷衍了。因为他们的心已被打得满是伤痕，极其脆弱，不可能再经历更多的伤痛，他们学会了保护自己。遂开始把眼光转到了比较实际和功利的一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若说在此之前，士人们还对社会和政府有什么期望的话，在此之后，几乎就消失殆尽了。他们以极其悲凉的心态去思考人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更多地投入了现实社会世俗生活的怀抱中。士风可谓就此大变。他们不再直言了，即使有，也是完全为名为利；他们不再认真做事了，做出好成绩又不会得到嘉奖，不如赶快趁机捞取一些实利，在做官任职上给自己谋取更多的实惠；有作为又怎么样？还不是辛辛苦苦一场空忙？为了谁？只有为自己是最保险的，只要在官场中讲究一些技巧，就没有任何风险。



## 三

朝廷中的士人，在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情况下，纷纷退而求其次。

阁臣唯唯诺诺而已，只是力求明哲保身，对皇帝依顺和迁就，对群下则宽大和容忍，有什么委屈也自己掖着、忍着，努力做一个皇帝和下级之间的传声筒和调和器。即使这样，也满足不了各方的要求，还是随时可以被挤出内阁。以万历时期的申时行为例，他苦苦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挣扎了八年，不是不想建功立业，但苦于皇帝专擅独断，朝臣又肆意攻击，同僚之间不但不能同舟共济，反而鹬蚌相争。想有所作为也是举步维艰。

言官们则视情况的不同，决定是否直言上谏，有利有名可图的话，就说一说，不愿意的话就不张嘴了，沽名钓誉的心态已经大大超过了忠君爱国。古往今来，中国的士人们一向是极其重视自己名声的，他们当然也要高官厚禄，但更看重树立完美的道德榜样，看重青史留名，以立德、立言、立功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唐太宗与魏征的佳话就始终为他们所津津乐道，做一个魏征那样的士人和官员，把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就实现了他们最真实的梦想。所以，在有明一代，士人们上书言事的风气都是很普遍的，包括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朝堂上据理力争，一次又一次地又在朝堂上痛哭流涕，都不过是为了从对朝廷的忠心里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客观上获得敢谏敢言的好名声。在明代中后期，他们的这个愿望之